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杨朔

YANG SHUO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杨朔代表作

谭兴戎 丁安仪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杨朔代表作

谭兴戎 丁安仪编 责任编辑 杨吉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11,875 插页1 字数 270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4,966

ISBN 7 - 215 - 01536 - x / I · 119 定价: 8.55元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注释和作家主要作品目录。《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了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前 言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山明水秀的胶东蓬莱县城，一个男孩诞生在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北街杨家，父亲为他取名杨毓璠。他，就是现代著名作家杨朔。

杨朔的父亲杨清泉（字镜海）先生，是清末的秀才，学问很好，思想并不守旧。辛亥革命时，他加入了共和党，致力于教育事业，是蓬莱第一任女子小学校长。杨朔的母亲柳端漪是一位聪明过人的女子，虽然没上过一天学，却通过自学达到能读懂《汉书》的水平。

在这样的家庭中，杨朔很小的时候就学唱歌，学认字，听母亲讲《三国》、《水浒》、《西游记》的故事，这对于天资聪颖的杨朔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启蒙教育。

杨朔五岁丧父，七岁跟着伯父读私塾，私塾停办后，又进入第四国民学校读书。十一岁考入当时蓬莱县最好的一所四年制高等小学——私立志城小学，他是校长姜致中先生最器重的学生之一。十五岁那年，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白士弘》，以杨蕴山的笔名发表在烟台《威克莱》杂志上。内容是讽刺、批判一个商人。当时，他告诉他三弟说，该文是有所指的。可以说，杨朔一生创

作的现实主义手法，在他的处女作中便已见端倪。

十六岁，他从志城小学毕业。蓬莱有个第八中学，但校风不好，他不愿去，想到外地读书。连年的苛捐杂税使得家庭经济也很拮据，他不得不暂时停学在家。志城小学姜校长请他去教书，他干了三四个月后因脚病作罢。后来便跟王本仁（号傲亚）先生学习英文，他学习十分用功，当年便可翻译《聊斋》上的短篇故事了。

十八岁那年夏季，他随舅舅去哈尔滨，一面在太古洋行当练习生，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文和中国古典文学。哈尔滨法政大学教授李仲都先生是他的老师。杨朔那时写了一些旧体诗词，很受李先生赏识。他为杨朔的一首诗写了和诗，末云：“蓬莱水秀山明山，如此清才有几人？”杨朔的诗常以杨莹叔的名字发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他爱看京剧，也时常为报纸写些戏评，所以有人说他是“哈尔滨的小才子”。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正直善良的杨朔不能忍受铁蹄下的奴役生活。他悲愤，他忧国忧民，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便偷偷阅读《铁流》、《毁灭》等革命作品，追求精神上的新天地。一九三六年，杨朔开始与哈尔滨地下党有了联系，并把自己的住处提供给地下党作为活动处所。一九三七年，日本宪兵队特务跟踪、威吓他，扬言要杀他的头，在那种形势下，只有走避。他办了调职手续离哈尔滨南下上海了。到上海后，杨朔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人筹办北雁出版社，此时，他使用了杨朔这个名字。可惜北雁出版社刚出版了几本书——郭沫若的《北伐》、中译本的《十月之夜》和《西班牙在火线上》等，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杨朔毅然辞去自己身上的职务，只身去了武汉。在武汉他生活

很艰苦，住在武昌花堤下街一幢破旧的二层小楼内，昼夜忙着为《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和其它报刊写了很多抗日救亡的文章。在黄鹤楼头，他对他四弟讲：“当前首要的是唤起全国人民，同心抗日。我决心用笔来战斗。”经党组织介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离开武汉经西安到了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毛主席；随后又离开延安到了山西抗日前线，并见到了朱总司令。这期间，他写了《毛泽东特写》和《西战场上》等文。

一九三八年春，杨朔离开山西南下广州。应《救亡日报》社林林同志之约，他写了以抗日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在《救亡日报》副刊连载。当时，他住在广州东郊的一间民房里，冒着敌机的轰炸整日写书。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前，杨朔沿西江水路到了桂林，又从桂林去了重庆。一九三九年六月他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去华北战场。访问团从重庆出发，经成都、绵阳、广元、宝鸡、西安、洛阳，北渡黄河到了山西抗日根据地。从此杨朔就留在华北，转战晋东南、冀南、冀中、晋西北、晋察冀各根据地之间。他虽然是个文人，但在战斗中却很勇敢，从不畏惧。

一九四二年，他奉党组织之命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生涯。

一九四五年底，他到河北宣化龙烟铁矿、庞家堡铁矿深入生活，写出了中篇小说《红石山》。该书尚未发表，解放战争就开始了。一九四六年十月，他把书稿托付给一位可靠的同志，就投身到战争中去。他担任新华社随军记者，并在部队师政治部任职，参加过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写了解放石家庄的报道《床

下将军》。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间写出《望南山》、《北线》两部中篇小说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和通讯报道。

一九四九年元月，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欢呼声中，杨朔来到了古都北平。二月三日他参加了庄严的北平入城大典并和白刃同志合写了通讯特写《前进，钢铁的大军》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从此，他的生活、艺术之路也和祖国一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一九四九年，他到中国铁路总工会任文艺部长。那时，他住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一所日本式房屋中，十几年来第一次有了安定的创作条件。一九五〇年，他写了中篇小说《锦绣山河》。然而，抗美援朝的炮声又打破了作家短暂的安定生活。一九五〇年十月，他以《人民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随中国铁路工人援朝大队奔赴朝鲜战场。在纷飞的战火中，杨朔的足迹踏遍朝鲜南北。他以饱蘸深情的笔写了许多歌颂志愿军英雄的通讯特写，这些作品结集为《鸭绿江南北》和《万古青春》。从一九五一年冬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半年多时间里，杨朔在“被敌机轰炸震得乱摇乱晃的朝鲜小茅屋”里完成了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这部作品在国内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后来又被译成外国文字，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还利用回国休假的时间，先后到大西北和东南沿海等地采访，写了《戈壁滩上的春天》、《厦门港的风浪》，并应苏联《文学报》之约写了《石油城》，这些散文和通讯后来编入通讯报告集《铁骑兵》。

一九五四年夏，杨朔从朝鲜回国。一九五五年调到作家协会工作，担任过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在这期间他为孩子们写了儿童短篇小说集《雪花飘飘》。这部作品，在一九

八〇年五月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党分配他搞文学艺术方面的外事工作。他参加了一九五六年在印度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接着又参加了一九五八年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一九五八年以后，杨朔调到亚非团结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后又任副主席，在国际上任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书记处的中国书记、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会秘书长。从此，他工作更忙了，常常一出国就成年累月不回来；一旦回国，立足未稳又走了。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安排个人生活，更无暇从容构思长篇巨著。但是，他宁可没有家室，不能没有创作。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十年间，他利用多少不眠之夜和旅居国外的间歇，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散文。这些散文结集为《亚洲日出》、《海市》、《生命泉》和《东风第一枝》。这十年中他只有一次得到了创作假，写出了长篇小说《洗兵马》的上卷《风雨》。以后，廖承志同志几次想给他创作假，都因为工作太忙而未能实现。《洗兵马》中、下卷终于未能写出，实为憾事。

一九六六年夏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是他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会议。一九六六年三月，他访问日本回国后所写的散文《雪国》，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

正当他的艺术创作日趋成熟时，也正当他为增强亚非人民战斗友谊作出不懈的努力时，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民族的头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也和许许多多人民作家一样，被批判、被揪斗、被审查；他的作品被打为“黑小说”、“大毒草”。对于一个以自己全身心去效忠祖国、党和人民的共产党员，这是怎样难以忍受的侮辱啊！在那个时代，不知多少天才被毁灭了，杨朔也在身心备受迫害的痛苦中含冤离开了人世，时为一九六八

年八月三日。

二

杨朔给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生前，他先后发表了散文二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篇，中篇小说五部，长篇小说两部。此外，还有五十多首旧体诗和两首新诗。

杨朔是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几乎是和他的革命活动同时开始，同步前进的，一九三七年杨朔一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寻求革命真理，就写了《绝情》一诗，表示以后着重写抗日文章，决心用笔来战斗，不再沉浸于个人的悲愁和愤懑之中。从此，无论是在烽火漫天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环境中，他都一面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接受锤炼和改造，一面进行反映现实斗争的创作。

杨朔的创作道路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1937—1949），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杨朔主要从事小说和通讯特写的创作。其中有《大旗》、《熔炉》等短篇小说十八篇，后来分别收在《月黑夜》和《北黑线》两本短篇小说集中；有以抗日为题材的《帕米尔高原的流脉》、以龙烟铁矿工人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为题材的《红石山》、反映解放区人民反复辟斗争的《望南山》、反映解放战争中晋、察、冀野战军战斗业绩的《北线》等四个中篇小说。还有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英雄军民战斗生活的一些通讯特写，分别收在《潼关之夜》和《铁骑兵》等集子中。

这些作品，一方面注重揭露和鞭挞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另一方面，更以高昂的热情，充

满信心的基调，真实地描绘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壮丽的人民革命的画卷，来歌颂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事迹并揭示他们在革命时代萌动和焕发起来的新的精神境界。从艺术上看，这些作品显示出杨朔早期创作朴实的现实主义的写实笔法。他追求真实准确，喜欢平铺直叙，这就不但使他的通讯特写真实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而且使他的小说也很难与通讯特写截然分开。正象他自己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真的，但又改头换面，经过些变动。小说里的故事，也都是矿山发生过的，不过由我整理起来，贯穿一起。”（杨朔《几句赘话》见《红石山》1949年8月出版，第93页。）甚至连小说中人物的姓名，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都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也都相同。所以，杨朔这个时期的小说，显得直：直接记录生活里的人物事件而缺乏艺术上的提炼加工；显得露：明白地表现作者的观点和爱憎而不主要通过人物形象本身来表达；显得浅：着重表现人物的外在行为而不注重对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的挖掘。这些反映了他艺术功力的不足。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时候的杨朔，或转战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或忙碌于民运工作之中，他想用笔作为武器，却又没有时间进行冷静的思索和艺术的推敲。杨朔明确意识到他作品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工农兵，所以他写成《红石山》之后，把稿子念给工人听，并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当时广大群众的文化程度一般不高，也没有过多的闲暇来品味艺术性更强的作品，他们在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过程中，更急切需要的是战鼓式的作品。因此，杨朔直露而充满热情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符合这个时候人民的需要的。

中期（1949—1955）即抗美援朝及其前后的一段时间。

这个阶段，杨朔仍然以小说和通讯、特写的创作为主。作品

有反映解放江南广大地区时铁道兵团某部修复粤汉铁路的中篇小说《锦绣山河》，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和收入《鸭绿江南北》、《万古青春》两个集子中的大量的朝鲜战地通讯、特写。此外，还有在回国休假时所写的一些反映祖国建设的通讯。

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是杨朔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它不但标志着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的重大突破，而且标志着建国初期长篇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在朝鲜战场上，杨朔长期和志愿军战士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亲眼看到战士们无数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亲身感受到战士们崇高的精神境界。“杨朔同志对工农兵的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达到一个新阶段。”（杨毓玮：《自有诗心如火烈》见《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2期）他深入了战士的生活，体察了战士的感情，因此作者就能够及时而准确地提炼了“表现志愿军对人民、对和平的热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见《写作自白》，《三千里江山》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63页）这个基本主题，反映了人民和战士的思想脉搏，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三千里江山》既注重人物个性的塑造，也注重对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思想风貌的刻画，这就使人物形象具有了强烈的典型意义。这种人物刻画上的多样性和深刻性，是杨朔早期小说所不具备的。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三千里江山》中很多内容，都可以从杨朔同期的通讯特写中找到根据，例如，第四段大桥抢险救火，姚长庚滚下大堤舍己救人的情节，就来自《鸭绿江南北》所记述的、在“十一月八号”那天发生的真实事件；第六段中朝鲜人民军见到刚刚入朝的志愿军，“眼泪喇的掉了，话也说不出口，大家上去抱着哭起来”的细节，也来自《鸭绿江南北》中朝鲜抢修大队保卫部长之口。从小说和真人真事的紧密关系这一点看，

杨朔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三千里江山》中的人物是经过作者集中、概括了的艺术典型，《三千里江山》的情节、结构是作者提炼加工了的艺术画面。作者已经从早期小说翻版复制生活的局限中摆脱出来，走向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生活的艺术之路。《三千里江山》另外一个相当突出的艺术特色是：这是一部充满了感情的小说。不但其中的人物是充满感情的人物，而且整个作品都洋溢着一种抒情诗的色调。作者在许多动人心处的关节上，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出来说话了”。（杨朔《写作自白》见《三千里江山》，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67页。）这些话，似叙事，似议论，而主要是抒情。它们凝聚着作者对祖国、对人民、对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可遏制的热爱和崇敬，有一股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杨朔这个期间写的朝鲜战地通讯，其真实性和战斗性自不待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的发展。首先，和杨朔早期同类作品比较，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开拓。它们反映生活的画面极为开阔，既有对抗美援朝战争总体画面的勾勒，如《鸭绿江南北》；又有对这场战争的各个方面、各种人物的具体描画，如：《万古青春》、《中国人民的心》、《上尉同志》等。作品中既有热情的歌颂，也有深刻的沉思，它们不但揭示了英雄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挖掘了英雄人物精神力量的来源，在具体的、个别的描写后面，透露出整个时代的特征。其次，这些作品和《三千里江山》一样，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浓郁的感情色彩。精当地穿插在叙述中的抒情成分，使作品时时闪露出浪漫主义的光辉。这种情况，在一九五四年所写的《石油城》、以及他刚刚归国时写的《京城漫记》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杨朔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在思想的深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外，还初步显示了一种喷发着主观感情的诗意的风格。通讯特写如此，长篇小说也是如此。《三千里江山》的某些片断本身就是颇有诗意的优秀散文。因此，可以说，杨朔这个阶段在艺术上取得的进展，是他后期艺术性散文产生的基础。

后期（1955—1968）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这期间，杨朔以散文创作为主，主要作品是收在《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四个集子中的六十多篇散文。此外，还有儿童短篇小说集《雪花飘飘》，长篇小说《洗兵马》上卷。

杨朔的后期散文，是他整个文学创作道路上取得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一半取材于国内，一半取材于国外，内容广泛，视野开阔。它们总是以火一样的激情，诗一样的意境和语言，深刻而细腻地展示着新中国的美，展示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精神世界的美。它启发人们更加热爱美好的祖国、光辉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它引导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伟大人民的正义事业和崇高的心灵。它激励人们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这是杨朔后期散文总的主题，也是它们具有征服人心的巨大魅力的思想因素。

杨朔后期散文的魅力还在于，作家独具匠心地创造了诗意、形象和哲理熔于一炉的诗化散文的风格，在现代散文百花争艳的园地里，增添了独秀一枝的新葩。他的这些散文具有诗一样的意境之美，诗一样的结构、布局之美，诗一样的语言之美。

诗的意境，是指诗的“意”（思想、感情）和“境”（形象）有机完美的结合所造成的思想教育和美感享受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意”是其灵魂，“境”是其血肉，而两者的结合，则是形

成艺术境界不可或缺的条件。

诗对“意”的表达，要求高度的艺术概括，要求在尽可能小的语言“容器”中装入尽可能丰富和深刻的内容，要求“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卷84，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2483页。）杨朔的散文正是如此。作者总是“想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东风第一枝》1961年，北京出版社第151页），他总是抓住那些平凡的人，普通的事，一点思想火花，一个生活片断，反映社会生活的宏观面貌。《香山红叶》写的是红叶、老向导，反映的是人民新旧社会的历史脚步；《荔枝蜜》写的是蜜蜂酿蜜，反映的是新时代人民的本质特征；《雪浪花》写的是浪花、老泰山，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宏伟力量；《埃及灯》从一盏平常的玻璃灯写起，表现了被压迫民族团结战斗的友谊；《鹤首》围绕一个精巧的鹤首瓶落墨，揭示了建立在自古以来就一脉相通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的中日人民的深情厚谊。这种小中见大的达意方法，因其抓住了“小”，就容易抓住具体的形象和触手可感的氛围，将笔端伸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因其主旨在“大”，就可能在人们不经心之处，揭示小事物中蕴蓄着的壮阔的时代特色和深刻的哲理。在杨朔笔下，“小中见大”一头联结着“境”，一头联结着“意”，成为“意”、“境”巧妙结合的桥梁。

杨朔散文和诗一样，总是把情景交融作为创造意境的重要手段。作者是写景的大手笔，他的散文往往由一连串异彩纷呈的画面构成，使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但是最使人心醉神迷的是，杨朔总是把自己主观感情了无痕迹地融汇在景物的描写之中，使景物活了起来，似乎在向你倾诉着缕缕情思。比如《海市》，全

文写了四处画面：虚幻飘渺的海市蜃楼，碧蓝碧蓝的镜儿海，生机盎然的海岛，万朵朝霞的花沟。这些画面写得有虚有实，有动有静，有色彩有声音，有全景有特写，极尽描景状物之能事。而且，作者把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对苦难历史的悲愤，对光辉现实的欣喜之情，都分别蕴含在不同画面的描绘之中，使人看不到“情”的抒发，却能感觉到“情”的存在。既给读者以形象之美，又给读者以抒情之美和意在言外的含蕴之美。

杨朔还特别善于运用中国诗歌“切类以指事”、“依微以拟议”(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文心雕龙》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01页)的比兴象征手法来创造散文的意境。他以诗人特有的敏锐感觉，准确地体会出某些具体形象中所包蕴的精微之义，又凭借富于感情色彩的形象思维过程，对具体形象进行选择、集中、加工，然后，围绕它们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于是，一篇以鲜明的形象为外部形态，以形象所包含的意义为内在神髓的散文就呈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作者把“意”托附在形象之中，而形象本身又往往是含义无穷的，因而读者不但能按照作者的启示去体会“象”中之“义”，也能浮想联翩，从形象中得到自己的发现。这样的文章，自然经得起咀嚼追寻，让人感到其味无穷了。例如《茶花赋》，通篇围绕着茶花的形象来写：写茶花的红艳，茶花之无处不在，写茶花之多，茶花的习性与栽培，写茶花老而不衰的经历；其间还通过联想，从茶花写到育花人；驰骋想象，把儿童、童子面茶花、祖国溶为一体，达到了托茶花以喻祖国的目的。作家仅仅在文章结尾点明主旨，而不肯在行文之中指明茶花与祖国具体特征上的联系，他让读者通过精心选择和提炼了的形象去品味，去生发。这样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有限的形象和无限的情思相辅相成，构成了杨朔散文诗的境界。

在多数篇章里，杨朔把比兴象征作为一个整体艺术手段，贯穿全篇。如上述《茶花赋》，还有《秋风萧瑟》、《雪浪花》、《荔枝蜜》、《海罗衫》、《蚁山》等等。有时候，作者又把比兴象征的手法浓缩到一个画面之中，你看：

“月亮一露面，满天的星星惊散了。远近几座金字塔都从夜色里透出来，背衬着暗蓝色的天空，显得又庄严，又平静。往远处一望，那利比亚沙漠，笼着月色，雾茫茫的，好静啊，听不到一星半点动静，只有三两点夜火，隐隐约约闪着亮光。”

——《金字塔夜月》

这是一幅色彩凝重的画，苍凉中蕴含着力量，象征着古老的埃及民族。

比兴象征的运用，贵在贴切、新颖、深刻。而杨朔散文的比兴手法，尤其以它的新颖引人注目。说它新颖，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杨朔敢于道前人所未道，比如以平凡的茶花，比“调尽五颜六色”也画不出的祖国面貌，以“蚁山”比非洲人民正在创造的惊人奇迹。二是指杨朔善于在人们惯用的比兴手法中翻出新意。以《荔枝蜜》中的蜜蜂为例：一般人或是习惯于用蜜蜂和辛勤劳动的人进行比附，或是借用唐人罗隐“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寓意来抒发不平之气。杨朔也用蜜蜂作比兴之物，但是他不仅反罗隐之意而用之，而且从一般人的用法上前进了一步，比兴用意之所在，落到了“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这个更高的境界上。因此，我们说，杨朔比兴之新颖往往是和命意之深刻紧密相连的。

上面，我们谈了杨朔散文在创造意境方面的特色。下面，我们再看看杨朔散文在结构布局和语言上的特点。